

# 严复和他的儿子严叔夏

王步征

严复及其哲嗣严叔夏以热诚的爱国思想和渊博学识传播和教授社会学是中国社会学史上颇值得一书的佳话。现就笔者几年来所收集的资料和参观严复故里以及访问严家后裔的所获，做一些介绍，以供研究者参考。

## 严复的社会经历与社会思想

严复于清咸丰三年十二月（公元1854年1月）出生在福建侯官阳岐（今福州市郊区盖山乡阳岐村）一清贫的家庭。初名体乾，学名宗光，字又陵、几道，晚年称愈野老人。父亲严振先是中医医生，医术高，医德好，医名传到省城后，在福州南台设医所。严复刚到7岁，就被送进村里一位老举人办的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学四年后到南台医所，父亲为他请来求医的省垣宿儒黄少岩为塾师，既教书，又讲史，讲宋、元、明典籍和有为物。严复聪明、好学、勤奋，学识长进，旧学基础牢固，尤崇敬民族英雄。阳岐村有个供奉宋尚书陈文龙的“尚书庙”。南宋末，张世杰、文天祥立益王于福州时，陈文龙出任闽广宣抚使，力抗元兵，威武不屈，英勇就义。严复从小敬仰陈文龙的民族气节和忠勇义举，到晚年回乡还捐资修建，并亲笔题写“尚书祖庙”扁额和为陈文龙歌功颂德的对联，其手书石刻至今尚存。

严复家中只有母亲和两个小妹妹，所以在他14岁时，其父严振先就命他与王家女儿结了婚。但第二年父亲去世了，一家五口搬回阳岐旧居，家无田园产业，靠母亲和妻子替人家绣花、缝洗维持生活，不敷时还借债，不但被人盘剥，而且被地痞无赖欺侮。他虽受尽苦楚，可更发愤读书。乡亲们称赞：“家贫子好学，严家出个好后生”。

马江船政学堂的苦读和海军舰上的实践。同治五年（1866年），林则徐的女婿、清船政大臣沈葆楨在福州马江创办船政学堂。严复得知，若能考取，不但衣食由学堂供给，每月还可以领四两纹银的津贴。他征得母亲的同意去应试，以第一名录取入学。在学堂里“所学者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解释几何、割锥、平三角、弘三角、代积微、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学等”。<sup>①</sup>严复勤学苦读，三月一考，成绩一等，尝银十元，寄回家用。他学习这些科学知识，为掌握军舰技术打下了基础，也为以后钻研西方科学文化奠下基石。学五年毕业，派到“建威”号军舰实习，次年调到自制的“扬威”号军舰上，南至新加坡，北至渤海湾，东达日本，还随沈葆楨到台湾巡视，前后又是5年。这10年的学习和实践，把他造就为优秀的人才。

在英国的三年深造与博览新学。光绪二年（1876年），严复以优异的成绩被选派赴英国留学，备为“海军良将”而让他深造。他同刘步蟾、方伯履、萨镇冰等13名优秀生进格林尼

<sup>①</sup> 见王遽常编：《严几道年谱》。

茨海军大学。严复除攻读海军科学技术，“考课屡列优秀”外，还努力阅读资本主义孕育和发展时期的各种社会学说，不但有近代西欧思想家哥白尼、牛顿、康德、培根、霍布士、洛克、笛卡尔等的论著，而且有古代欧洲思想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德谟克里特等的论著，特别认真研读达尔文、赫胥黎的进化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卢梭、孟德斯鸠和斯宾塞的社会学。他还接触和考察资本主义发展至全盛时期的英国社会，并到法国游历和考察。英、法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经济发达、物质文化生活高，同清末封建社会的没落腐败和民众的贫困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与清政府驻英公使郭嵩焘从相识到相知，共同切磋、探讨。两个世界、两种生活的比较和选择，使他倾慕之情溢于言表，从心坎里埋下了革新社会的种子。这三年的博览、探索使他成为郭嵩焘所赞赏的“才华横溢、博学高才之士”。

天津水师学堂教习和推进维新思潮。严复于1879年学成回国。当时，任两江总督的沈葆楨聘他为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次年沈病故，北洋大臣李鸿章把他调到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尽管他才华出众、能管好全学堂事务，但没有科举资历，当不上总办（校长）。他去参加科举考试，老“八股”容不得新思想，屡试不第。他不得不花钱捐个“造用知府”头衔，才当上总办。他很想作一番建树，但在李鸿章洋务官僚的控制下，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1884年中法马江战役，由于指挥的错误导致海战的惨败，严复对李鸿章等很不满。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李鸿章又命令不抵抗，把军舰躲藏在威海卫内港而美其名为“猛虎深山”战略，结果使整个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严复发表文章强烈抨击，“猛虎深山，徒虚论耳”。李鸿章“患其激烈，不之近也”，屡加压制。严复还看到李纵子为非，杀人行贿逍遥法外，深感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清廷官僚的腐败。甲午战争失败后，清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各帝国主义为划定“势力范围”急要瓜分中国，整个国家处于危亡之中。他在德国人办的《直报》上，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等文章，鼓吹变法维新、救亡图存，从理论和战略上指导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发起的维新变法运动。接着同王修植、夏曾佑等创办《国闻报》，亲自撰写《论中国教化之退》等二十多篇社论，推进变法维新思潮。到1898年（即农历“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正是德、俄、英、法、日等列强瓜分中国危机的严重时候，又是光绪思考变法的重要时刻，严复将译著《天演论》以木刻出版，告诉人们“优胜劣败”的规律和“人与天争”而终“胜天”的道理，呼吁只要发愤变法自强，中国仍可得救。同时在《国闻报》上发表《拟上皇帝万言书》，阐述富国强兵的方略，并指出“变法则慎勿为私利者之所把持”的策略。国人为之振奋，皇帝为之震撼。光绪召见严复，询问对变法的意见。光绪召见康有为等后，下诏变法。变法维新运动如火如荼，而那拉氏、荣禄一伙胆战心惊，他们阴谋政变，囚禁光绪，杀害“六君子”。维新运动仅“百日”就夭折了。严复虽然由于没有同康、梁直接免遭杀害，但他所创办的《国闻报》被封闭了，他革新社会的雄心及其政治生命受到沉重的打击。他感到“手无寸铁的书生”斗不过封建的反动势力，可又认为社会革新“必待民之智勇”，用新理论“开民智”，国家还有希望，自己还有作为，他决心“致力于译述警世”。于是于1900年结束在天津20年的教习和奋争生活，移居上海专事译著。

严复当时的社会经历和社会环境，形成了他的社会思想：

其一是爱国思想。中国的悠久历史和辽阔领土，众多的民族英雄和仁人志士为她的昌盛而奋斗，受后人所歌颂；而那些为“私利者”祸国殃民，被后人所唾弃。民族的传统和社会的舆论，使熟知历史和驾舰海疆的严复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这就是鲜明而强烈的爱

国思想。尤其是在国家民族濒临危亡的重要时刻，他为了自己的祖国义无反顾地奔波呼号，主战反和，救亡图存。他在《原强》和《原强续篇》中大声疾呼：“唯有与战相始终，万万不可言和，盖和则终亡，而战可期渐振”。“呜呼！和之一言，其贻误天下，可谓罄竹难书矣！”“今日之事，舍战固无可言，使上之人尚有所恋于和而不早自断焉，则国亡矣”。他得悉清政府决定同日本签订卖国条件时，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以沸腾的心血吐露出爱国的强音。

其二是革新思想。严复在向西方寻找真理中，接受达尔文、赫胥黎的进化论，也接受孟德斯鸠、斯宾塞的社会变革思想。他深信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不发展就要倒退，人类要不断进步，不进步就会被淘汰。英国、法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社会就是从封建落后社会变革发展过来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封建官僚的腐败，一定要变革要发展，不变革不发展就会被消灭。社会要变革，选拔人才的制度也要变革，用“八股取士”，就会破坏人才，导致国家贫弱。他在《救亡决论》中指出：“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这都是他的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所以他不遗余力地鼓吹变法，支持维新运动。

其三是民本思想。这种思想既来自西方近代的思想家，又来自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同时也受西方当代资产阶级所提倡的民主、自由、平等的影响，更看到当时中国封建专制对民众的压制。他在《辟韩》中引用孟子说的“民为重，社稷次，君为轻”，猛烈抨击韩愈的君主专制、君权至上论，鲜明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民众是国家的主人，就应享有民主、自由等权利。如果民众没有民主、自由，没有权利，国家不堪设想；民众有了民主、自由，国家就会强盛：“吾未见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国可以自由也。其民之无权者，其国之可以有权也。……民权者，不可毁也。必欲毁之，其权将横用而为祸烈甚者也。毁民权者，天下之至愚也。”“民主者，治制极盛也。使五洲而有郅治之一日，其民立乎！”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见解，是有胆有识的论争。他还针对当时的愚民政策和民众文化的低下，极力主张“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民众的素质。

严复把自己的爱国思想、革新思想和民本思想，付诸19世纪90年代的国家救亡图存、推进变法维新运动的行动中，进而贯串在20世纪初的鸿篇巨著的社会学说译著中。

### 严复的社会学说译著与社会影响

严复的社会学说译著共11部，除了《天演论》于1898年在天津以木刻出版外，其他10部是移居上海后译著出版的。我们之所以统称为“社会学说”，因为这11部含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逻辑学等都是反映19世纪西方社会思潮的代表作，是分析研究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的见解和主张。之所以称为“译著”，因为都是按原著意译，用文言文和自己的语言译出，并且照自己的观点进行取舍，加上自己的序言和许多案语、译例。这就构成他的译著有独具的特点：1.有明确的目的性，具有现实意义；2.有明确的倾向性，反映自己的政治态度和主张；3.要做到自己所要求的“信、达、雅”，即准确、鲜明、尔雅而有艺术风格。

严复的第一部译著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著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他改名为《天演论》，经校阅、删改后，用石印再版，阐述宇宙万物至人类社会都在演变的道理，而这演变是遵循“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规律和法则的。他认为造成民族危机的原因在这里，拯救危亡的办法也在这里。在列强要瓜分中国的危亡之际，只有奋起图强，才能“适者生存”，求和不奋争，成为“弱肉”必被“强食”，被天演法则所淘汰。这些强烈的观点和深刻的论述，震动了当时的思想界和爱国者，从理论上武装和指导变法维新运动及其领导者。

然而，严复虽然赞同赫胥黎主张人不能被动地接受自然进化，要奋力图强，与自然斗争，但不同意赫胥黎人性本善、社会伦理不同于自然进化的观点。于是，在“戊戌政变”后，他选择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他赞同斯宾塞的自然界进化普遍规律也适用于人类的观点。他早在《直报》上就备加赞赏：“美矣备矣，自民生以来未有若斯之懿也。虽文（文王）周（周公）生今，未能舍其道而言治也”。他易名为《群学肄言》，并在序言中解说：“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就是说，群学是用科学的法则来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以预测将来；肄言是究其功用的实施，提出治理的良方。要之，研究群学肄言，是为了探明治乱及盛衰的道理，以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1903年出版，高凤谦作序赞曰：“《群学肄言》一书，几二十万言。学之必精，言之必慎。欲读严子之书，必先读《群学肄言》。”但严复又感到斯宾塞“任天为治”观点的缺陷，强调要自强、自立、自力、自治。他按照自己的政治态度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取赫胥黎和斯宾塞的合理内容，舍他们的不合理部分，大大增强社会效果，译著一再再版，论点到处传播。特别是《天演论》这一哲学和社会学理论的传播，不仅“轰动一时”，而且在长期增强人们斗争、进化、自强、自立的观念，激励人们奋发图强，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打开前进的道路。这本书及其思想风行远近，获得巨大的成就。

经济学是选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译为《原富》。这部长达45万言的长篇巨著，阐述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正是中国资产阶级开始发展的反映和要求，当时由于国外资本输入所面临的种种问题，需要经济理论来解决。严复并用许多案语阐发这些要求，特别提倡发展工商业、发展自由贸易，以实现资本主义，批判封建统治者的苛捐和外国侵略者的掠夺。在1902年出版，有助于中国民族资本冲破压制和束缚，适应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是符合民众的利益，所以在社会上产生良好的效果。

政治学和法学，是于1903年至1905年选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著的《自由论》译为《群己权界论》、英国资产阶级学者甄克斯著的《社会进化简史》译为《社会通论》、法国革命前进步思想家孟德斯鸠著的《法意》。《群己权界论》是资产阶级政治学的重要著作，阐述资产阶级的自由观。《社会通论》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进化要经过图腾、宗法、军国三个社会，他把军国社会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加以阐发。《法意》又是一部45万言的巨著，是影响最大的法学译著，它论述世界各国政治及立法的源流与得失，指明法的本质，提出社会改革计划。它深刻揭露法兰西封建主阶级压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极力鼓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主张，宣扬自由平等的进步思想，提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著名学说，这对当时封建专制腐败、民族危机深重、民众深受压迫、毫无自由可言的中国社会，是针锋相对的，很有现实意义。严复在案语、译例中强调自由民主的益处和不许压制的道理：“为思想、为言论，皆非刑章所当治之域，思想言论，修己者之所严，而非人治者之所当问也”。“须知

言论自由，只是平等地说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法意》的翻译和出版，西方民主主义政治思想的宣传，使人们从中吸取到新的精神力量。反对封建专制统治、提倡民主自由平等，不但为广大社会成员所接受所倾慕，而且为许多有识之士所追求和推行。

逻辑学是选约翰·穆勒著的《名学》译为《穆勒名学》，和与穆勒同时的英国思想家耶方斯著的《名学浅说》。名学就是逻辑学，是论述思想方法的。严复深知要解放人们的旧思想，务必提倡新的思想方法。他在这两部译著中介绍归纳法和演绎法，着重阐述和提倡归纳法，成为“集归纳法之大成”的论著，用它来批判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宋明理学”的“天”“道”不变，批驳维护封建势力和买办阶级利益的洋务派标榜的“中学为体、西法为用”的主张，揭穿在政治上依靠外国侵略势力以维持封建特权世代不变的黑暗统治。他而且认为重视社会实证，运用科学方法，才能取得国家建设的重大成就。他列举牛顿、伽利略、哈维等运用培根等创立的逻辑学，取得近代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来论证逻辑学的实用价值和重大作用，进而强调这是中国所应学的根本方法。这两部译著出版于1905和1909年，它们的问世，受到思想界的热烈欢迎，被誉为“一时风靡，学者闻所未闻，吾国政论之根柢名学理论者，自此始也”。<sup>①</sup>这在当时影响了广大知识界，在以后也影响了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

以上八部译著被称“八大名著”。还有两部关于教育方面的译著、一部根据外国报刊消息和社论编辑的《欧战缘起》。教育方面的译著是《支那教案论》和《中国教育议》，论述发展教育的重要性，提倡受教育者要在智、德、体几方面发展，以“开民智”、“新民智”、“鼓民力”。这两部教育学译著，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总起来说，严复译著的反响是巨大的，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这除了从理论上指导和推进当时的变法维新运动外，并在以后的若干年代发挥其思想武器的作用。王佐良在介绍“八大名著”时说：严复“知道事涉根本，必须彻底改革中国社会，而要改革奏效又必须引进一整套新的思想。他所翻译的书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每一本都是资本主义思想的奠基之作，涉及到经济、政治、哲学、社会等重要方面，合起来构成近代西方的主导的意识形态系统。正是在这一点上严复表现出他是一个不同一般的高超译者：他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比人们所承认的要深得多，他想通过翻译达到的目的也比人们所觉察的要大得多”。“他成功了：……理论大书介绍到了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使得其中对西洋文化兴趣甚至有反感的人也认真阅读和思考起来，产生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有的具有严复本人始料所未及”。<sup>②</sup>要问“产生了一系列”什么样的“重大后果”？“严复在中国近代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使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真正打开了眼界，看到了知识的广阔图景：除了中国的封建经典的道理以外，世界上还有着多么丰富深刻新颖可喜的思想宝藏。……这样，中国近代先进人士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行程踏进了一个崭新的深入的阶段。这一事实是极为重要的，它从根本上打开了人们的思想眼界，启蒙和教育大批中国人，特别是爱国青年。从严复同代或稍晚一些的人，到鲁迅的一代，到鲁迅更年青的一代，无不身受其赐”。<sup>③</sup>这不是很好地概括严复译著的巨大的社会影响和其所发挥的社会作用了吗！

① 见王遽常编：《严几道年谱》。

② 见王佐良：《严复的用心》。

③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论严复与严译名著》第128页。

## 严复传业与严叔夏受业

严父课子，京津勤学。严复长子伯玉，早立在外，次子仲弓七岁病亡，三子叔夏，于1897年7月生于天津，名璜，字普贤，从小勤奋读书。严复课子严格，要求儿子读书专心不走神，写字坐正不歪斜，文具整齐不乱放，各门功课学好不敷衍。尤其是学好数学，使思维有条理，讲话和做文章不紊乱。严叔夏勤学不懈，从天津学堂，到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再入北京清华大学学习，成绩都是优良，文章也写得好。但严复并不满足于儿子在学校所学的正规课程，他根据自己获取丰富知识的体验，要求有名师教授，自身勤学，还要在良好的学习环境中磨练。所以他在天津为儿子延师授课，自己加以指点。他请桐城古文名士姚永概，著名诗人陈立三、陈宝琛教古文和诗词，又请天津英语教师教英文，用英语学原著，不用译文。自己指导儿子写作文章、做诗填词，并让他同教师、名人们唱和，虚心求教。严叔夏经过几年的刻苦学习和实际磨练，在经、史、诗、文、哲学、外语和自然科学，都有良好的基础，而且练得一手好书法，也善于绘画。他虽然没有学完清华大学所规定的课程，而他的学识，文章已超过大学毕业水平，不但清华大学发给毕业证书，江西心远大学也发给文科特别生毕业文凭。

饱读父亲论著和译著。严复眼看儿子学业有成就，想让他出国留学，但严叔夏则被父亲的论著和译著所吸引。他先是听到父亲同友人谈变法维新时的壮烈情境和戊戌政变后的悲惨遭遇，既激起他的爱国热情和对封建专制的愤慨，又引起他对父亲论著的兴趣。他找出父亲保存的《直报》和《国闻报》，读了严复所发表的文章和所写的社论。这些战斗的“檄文”，更使他对父亲译著的喜好，他从《天演论》、《群学肄言》到《穆勒名学》、《名学浅说》，再到《中国教育议》，一本一本认真阅读，还常做笔记，有赞成其内容好的，有欣赏其文字美的。如他用工整的楷书，记上《群学肄言》第五章一段“理达”而“文美”的文字：“望舒东睇，一碧无烟，独立湖塘，延赏水月，见自彼月之下，至于目前一道光芒，滉漾闪烁，谛而察之，皆细浪沧漪，受月光映发而为此也。徘徊数武，是光景者乃若随人。颇有明理士夫，谓此光景，为实有物，故能相随，且亦有时以此自讶。不悟是光景者，从人而有，使无见者，则亦无光，更无光景，与人相逐。盖全湖水面，受月映发，一切平等，特人目与水对待不同，明暗遂别。不得以所未见，遂指为无。是故虽所见者为一道光芒，他所不尔。又人目易位，前之暗者，乃今更明。然此种种，无非妄见，以言其实，则由人目与月作二线入水，成角等者，皆当见光，其不等者，则全成暗。惟人之察群事也亦然，往往以见所及者为有，以所不及者为无，执见否以定有无，则其思之所不贖者众矣”。他深感要了解社会现象的实质，必须深入社会进行观察。又如他笔录《中国教育议》的一段：“‘科目过繁，过其留驻力之所堪任，而心尝神会之能，则丝毫无所发展。不但其无所发展也，且重困之。是以学成如木鸡然，常识且丧，而推籀之心力全无。其为学既少优游之趣，自无自得之欣，勉勉何为，凡为考耳。问彼何为而宁若停辛若若此，无他，求毕业之文凭也。无此文凭，寒士一入人间，计且无从得食。……是以吾辈之论此事，宜悬两端于心目，一是虚糜精力，一是将以谋生。但试问不必虚糜精力，而可以省费且资生者，夫岂无法’。此鄙人之所欲入后详发，以就正诸公者也”。<sup>①</sup>这段话是严复引日本早稻田大学教员告诫学生的话，

<sup>①</sup> 见普贤：《笔录》。

严叔夏也是深表赞同的，学习不要单为考试求文凭，而要认真求有用的学问。这些，对他以后从事教育事业是有深刻影响的。

郎官巷通读中外史。严叔夏的聪颖和真才实学，博得他老师陈宝琛的赞许和喜欢。陈亲自向严复说亲，把自己妹妹的女儿亦即台湾林尔康的女儿林慕兰配与严叔夏。林慕兰知书达理、事母至孝，严复欣然同意，于1919年元旦送二十三岁的儿子回闽，在故乡玉屏山庄为叔夏与慕兰举行婚礼。随后在福州郎官巷买了一套有大书房的房屋，给儿媳居住，并要求儿子继续读书，随时将读书情况写信向他“告明”，他也约定要做到“有信必复”。严叔夏曾从经史和译著中了解中国的一些古代史和外国的一些近代史，尔后日益感到历史的重要，“观史可鉴今”，他准备用七年的时间通读“二十四史”和英文世界史，并写信告诉父亲。严复及时复信鼓励和指点“甚好！但此书不是胡乱看得，非用过功夫不知所言着落也。二十四史及英文世界史尽七年看了，‘先生之志则大矣’，苛践此语，殆可独步中西，恐未必见诸事实耳。但细思之亦无甚难做，俗谚有曰：‘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得见有恒则七级浮屠终有合尖之日。且此事须三十以前为之，四十年以后虽做亦无用，因人事日烦，记忆力渐减。吾五十以还，看书亦复不少，然今日脑中岂有几微存在？其存在者依然是少壮所治之书。吾儿果有此志，请从中国前四史起。其治法由史而书而志，似不如由陈（三国志）而范（后汉书），由班（汉书）而马（史记）。此顾虎头（晋顾岂之字虎头）所谓倒啖蔗也”。<sup>①</sup>严叔夏照父亲的指点，按序细读，求得真知灼见。他几年的用功，对以后的教学、讲演都很有用处。

### 严叔夏秉承父志从事教育事业

严叔夏从儿童、少年到青年一直努力学习，追求真理，学识渊博。他受家学的熏陶和父亲的影响，满怀爱国热诚，从事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人才。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的先人没有做过官，几道先生（严复字几道）自英国留学回国，做的是船政学堂教习，后来做了水师学堂总办，都是操教书生涯。可能我受了家学的影响，也是从读书到教书”。<sup>②</sup>他在旧社会虽然遇到种种困难和困惑，但为了“开民智”，唤起民众和培养人才，始终没有离开教学岗位。他先后应聘为福建学院、协和大学、福建师专为教授，讲授中文、哲学、社会学、文化史等课程。“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入，福州沦陷，他把夫人和子女先送往上海后赴台湾岳家，自己随协和大学迁到邵武，坚持教学，以后又到闽清、南平，分别在福建学院、福建师专任教。当时祖国山河破碎，人民流离失所，在国民党统治的黑暗社会里，他痛心、愤慨、焦虑。他为了寻找出路，阅读《西行漫记》等进步书刊，看到光明前景，同友人探讨唯物辩证法，抒发自己的观点和寄望。抗战胜利后，他随协和大学迁回福州，任文学院院长和中文系主任。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千方百计借、购马列著作，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党的整风文献，他越读思想越开朗，心情越舒畅。他从熟读资产阶级社会学说到无产阶级社会学说，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观转向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他的思想得到升华，他的教学增强思想性，他同学生运动积极分子结成知心朋友，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的地下活动，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鼓励学生参加革命斗争。1949年8月福州一解放，他就在福建学院开讲“唯物史观”和社会学。新中国建立后，他兴高采烈

<sup>①</sup> 见严家理：《严先生及其家庭》。

<sup>②</sup> 见吴修乘：《追忆严叔夏副市长》。

地为发展教育而工作，1950年被选为协和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并讲授辩证唯物主义课。1951年他积极筹建福州大学，福大建立，他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任教务长和中文系教授。1952年被任命为福州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工作，常应邀到各大学讲课做报告，直到1957年，他都没有离开大学讲坛。

严叔夏以他的爱国诚心、教育热情和丰富的社会学知识，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人才，为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严叔夏不但继承了父亲热爱祖国、严谨治学和执着地追求真理、传播知识的精神，而且能够面对现实排除困难，找到了父辈寻找而未获得的救国真理，从而从传授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转向传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说。他第一个在福建学院设立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开讲“唯物史观”，并讲社会学。他讲“唯物史观”，先讲立场、观点、方法。他以乌山一块巨石为例，说明不同职业的人对它有不同的看法和用法，地质学家看到它，分析是火成岩还是水成岩；建筑学家看到它，研究是做石柱还是做台阶；艺术家看到它，看看怎样描绘得最美；如果是一对恋人到这里，就会把它作为谈情说爱的好所在。他以这样生动易懂的比喻，使学生们领悟到立场、观点的重要，进而引导大家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讲社会学，先讲社会发展史，他以每个人从胚胎、出生、儿童、青年、壮年、老年到死亡的必然过程，说明人类社会也必然经过这样发展的过程，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被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再向人类最美满的共产主义社会前进。他进而引导学生面向社会，为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而参加革命斗争。<sup>①</sup>这在建国前夕对青年学生是极好、极难得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严先生教导了许多学生，使他们走上革命征途。

二、严叔夏渊博的学识和生动的教学，受到受教育者的热烈欢迎，学生们喜于接受，能够很好地吸收，深受学生们的爱戴。这也就使他所教过的学生具有真才实学。他的高足俞元桂教授说：“业师叔夏先生是严复的哲嗣，抗战期间执教于协和大学，他精究中国古代诗词和佛老哲学，课堂讲授，业余絮谈，风神潇洒，妙语连珠，深得学生们的爱戴；有时他也对我们谈起太老师的为人学，以及对他学业的关注和指点”。<sup>②</sup>的确，学生们是幸得其教，深受其益的。黄政在他所写的《严叔夏生平》一文中有两段概括性文字：“讲课是他生活的重心，也是他生活中最感愉快的时刻。学生也喜欢听他讲课，所到之处，往往连教室的窗台也挤满了人，各个系的学生都有。”“他学识渊博，言之有物，又善于表达，每能触类旁通，且富于哲理，很受学生欢迎。他在大学讲坛上度过了一生中的主要时光，以其精湛的学术素养和不倦的海人之诚，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有真才实学的学生，其中有些人至今仍是我国文坛的知名学者、教授。”

三、严叔夏以社会学者的风度为人处事和待人接物，既“为人师表”，又在工作中作“表率”，受到师生们的尊敬和得到社会的敬重。曾经同他一起在福建师专任教的郑庭榕回忆道：“严先生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位深居简出的饱学良师。当时我在教社会学和近代史，也常跟一、二位教师于晚饭后到严先生的房间去听他谈天说地，他的只言片语，好似‘天女散花’般飞落座间，真是谈笑风生，妙语解颐，令人如坐春风，顿使我多少有些绷紧的心弦和不安情怀如释重负地宁静下来。好似一次令人沉浸在愉悦的美的享受里。……严

<sup>①</sup> 见王步征：《学院听课笔记》。

<sup>②</sup> 见俞元桂：《严复与家乡》序。



先生有桃李万千，遍布八闽和全国，有不少是社会名流和贤达之士。”<sup>①</sup>

## 严复父子的社会位置

人们在社会上的位置，是根据他们为社会所作的贡献决定的。严复父子在社会应占什么样的位置，也是取决于他们为社会所作的贡献。

在马克思主义“送来”中国之前，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的黑暗社会里，严复远涉重洋向西方寻找真理、在中国传播社会变革理论，如同启明星般照射当时知识界前进的道路，是难能可贵的，人们给以高度的评价，社会给予相当重要的位置。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特别指出：“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sup>②</sup>毛泽东同志从青年起就很重视阅读严复的译著，周恩来同志还特地写信向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借阅严复的“手迹”（严传全抄录）。孙中山在伦敦同严复会晤时称他为“思想家”。鲁迅赞赏他是“感觉敏锐的人”（《热风》）。梁启超誉他为“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新民丛报》一期）。蔡元培赞他是“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sup>③</sup>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的1912年，他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北京大学校长）。《严复集》主编王栻是这样总结严复的作用的：“总之，严复在当时新的资产阶级的‘西学’与旧的封建主义的‘中学’的斗争中，进行了积极的战斗，这对以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起了启蒙作用，这种历史的功绩，是应该予以肯定的。”<sup>④</sup>“严复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不是甚么‘法家’，也不在于代表了资产阶级改良派，而在于他是中国资产阶级主要的启蒙思想家。他代表了近代中国向西方资本主义寻找真理所走到的崭新阶段，他给中国人以一种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起了空前的广泛影响和长远作用，这种启蒙影响和作用不只是在戊戌时期和对改良派，更主要更突出的是对后几代的年青的爱国者和革命家。”<sup>⑤</sup>这些评价都是实事求是的，符合历史发展实际的，是严复在社会上应享有的位置。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和历史的原因，他后来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袁世凯“政府参议院参议”，被列为“筹安会发起人”；他老年时体弱多病（于1921年10月67岁时病逝），思想保守，推崇孔孟；以及他的某些政治主张的局限等，是消极方面，有的是倒退的。

严叔夏继承父亲的爱国思想和传播社会学说，并在历史的发展中，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提高自己，从传播资产阶级社会学说，转向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把父辈“教育救国”所做不到的理想，付诸大学讲坛的实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得到实现。他从事多年的教育事业所付出的心血，浇灌了许许多多的花木，为祖国培养了许许多多的人才。

然而，遗憾的是他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晚年“隐居”在东街小巷竹林境住所内。当组织上为他平反时，他已到体衰多病的暮年，于1962年9月65岁时不幸病逝。

① 见郑庭裕：《回忆严叔夏》一文。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4页。

③ 见申报编：《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

④ 王栻：《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

⑤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论严复与严译名著》第127页。

## 两 点 建 议

一、建立严复纪念馆，收集和陈列严复父子的论著、译著、讲稿和书信等文物，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并作为理论学术探讨的内容，繁荣学术和教育事业。据严复侄孙女、退休教师严培庸的了解和收集，严复除十一部译著外，还有论文一百多篇、诗词二百多首、书信三百多封。据严复的孙女、严叔夏女儿严停云在台写的《我的祖父〈严复思想述评〉重印跋后》说：“海军指挥参谋大学建了一座‘严复纪念馆’”，重印中英文对照的《严译八种》以及严复的“诗文、短札”及其手批的《老子》、《庄子》、《王荆公诗集》等。另据黄政在《严叔夏生平》中提供：叔夏“他一生所写大量讲义，都以教学为目的，偶尔发表一些诗文。”并已找到了一些文章和诗作。这都应不失时机地抓紧收集。

二、成立严复学术研究会，研讨严复的论著、译著及其学术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及其历史唯物论的指导下，继承和发展其合理的、积极的部分，扬弃其不合理的、消极的东西，记取和防止倒退的教训，从而促进社会科学更好地发展。

### 主要参考文献：

1.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论严复与严译名著》。
2. 政协福州市郊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严复与家乡》。
3. 赫胥黎著：《进化论与伦理学》、《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科学出版社。
4. 严复译：《天演论》、《群学肄言》等，商务印书馆。
5. 东尔编：《严复生平、著译大事年表》（1854—1921）。
6. 阳岐村“严复陈列室”严复手稿、手书石刻等文物。

作者工作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陈庆利

## 北京市社会学学会召开第二届年会

1990年4月2日，北京市社会学学会在京召开了第二届年会。雷洁琼会长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1984年首届年会至1989年底学会的主要活动。会上还召开了学术报告会并选举产生了第二届理事会，选举雷洁琼为名誉会长，袁方为会长，理事55人，常务理事15人。